

doi:10.3969/j.issn.1672-626x.2019.01.015

范仲淹诗歌创作中的孔颜乐处观

张杰

(重庆邮电大学 素质教育教研部,重庆 400065)

摘要:“孔颜乐处”是范仲淹矢志持守的人生准则,并在此影响下暴霜露,斩荆棘,戮力上国。相较程颐、程颢之“孔颜乐处”观,范氏说虽亦有心性修养之味,却更加贴近实际。作为一代诗雄,范仲淹更将“孔颜乐处”深深地内化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当中。正因如此,范仲淹的政治咏怀诗和塞上咏怀诗才会显得富丽中见峥嵘,闲散后存血性。

关键词:范仲淹;孔颜乐处;诗歌创作

中图分类号:B244;I207.22

文献标志码:A

文章编号:1672-626X(2019)01-0119-07

一、范仲淹之“孔颜乐处”观

范仲淹一直以来都是历代士大夫称颂和学习的榜样,甚至被视为宋代士风、学风开山之人。欧阳修为其撰墓碑曰:“公少有大节,于富贵,贫贱,毁誉,欢戚,不动其心,而慨然有志于天下。”^{[1]333}王安石在《祭范颍州文》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。苏轼《范文正公文集序》:“如饥渴之于饮食,欲须臾忘而不可得。”^[2]朱熹评说:“范文正杰出之才”,“本朝道学之盛,亦有其渐,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,如山东有孙明复,徂徕有石守道,湖州有胡安定,到后来遂有周子、程子、张子出。”^{[3]3088}《宋元学案·高平学案》云:“高平(范仲淹)一生粹然无疵。”^[4]吕中曰:“先儒论宋朝人物,以范仲淹为第一。”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曾曰:“自古一代帝王之兴,必有一代名世之臣。宋有仲淹诸贤,无愧乎此。仲淹初在制中,遗宰相书,极论天下事,他日为政,尽行其言。豪杰自知之审,类如是乎!考其当朝,虽不能久,然先忧后乐之志,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,足任斯责,使究其所欲为,岂让古人哉!”^{[5]10295}王夫之曰:“(范公)以天下为己任,其志也。任之力,则忧之亟。故人之贞邪,法之疏密,穷檐之疾苦,寒士之升沉,风俗之醇薄,一系于其心。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,则好善恶恶之性,不能以纤芥容,而亟议更张;裁幸滥,核考课,抑词赋,兴策问,替任子,综核名实,繁立科条,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,乐用之而不倦。”^[6]

以上这些对范仲淹近乎“完人”的评价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指向——士大夫的坚守和担当,而坚守与担当的背后是范仲淹始终不变的“孔颜乐处”人生理念。“孔颜乐处”本来是孔子及颜回对于士大夫人生苦乐的一种选择态度。《论语·述而》: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^{[7]226}《论语·雍也》:“贤哉回也,一簞食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”^{[7]267}这两段叙述看似是在谈颜回与众不同的“快乐”,其实是在强调士大夫在孤独困窘中对于自我信念的坚守。对于此处之“乐”,程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“须知所乐者何事”^{[7]97}。“非乐簞瓢陋巷也,不以贫窶其心改其所乐也。”^{[8]87}在程颐看来,乐与

收稿日期:2018-11-12

基金项目:国家社科基金(10BZW044);重庆市社科联青年项目(2016QNWX36)

作者简介:张杰(1985-),男,甘肃兰州人,重庆邮电大学素质教育教研部讲师,文学博士,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。

不乐完全在于“心”之“不改”。范仲淹也如同先贤一样立说明志,《睢阳学舍书怀》:

白云无赖帝乡遥,汉苑谁人奏洞箫。多难未应歌凤鸟,薄才犹可赋鹤鹑。瓢思颜子心还乐,琴遇钟君恨即销。但使斯文天未丧,涧松何必怨山苗^{[9]66}。

这首诗作于大中祥符七年,范仲淹时年26岁,仍在应天府书院读书。此时的范仲淹还没有获取功名,寥寥数言恰恰道出了范文正公一生的人格追求。在这首诗中,诗人虚言“闲愁”,实写士人“孔颜之乐”。诗人自比悠游于帝乡之外的浮云散客,虽无所拘束,然闻洞箫仍有不遇之苦。东汉王褒《洞箫赋》写尽洞箫清苦悲切之音,诗人借此言说自己一生的命运多舛^①。下句笔锋一转,诗人自觉虽无福咏唱凤鸟之章,却仍可有吟诵《鹤鹑》之志。张华有《鹤鹑赋》,其云:“色浅体陋,形微处卑,繁滋族类,乘居匹游,翩翩然有以自得。”又“伊兹禽之无知,而处身之似智……静守约而不矜,动因循以简易。任自然以为资,无诱慕于世伪”^[10]。此赋言鹤鹑虽小,却能安守己道,遂“不为人用”且“物莫之害”。鸟之“自然以为资”和“无诱慕世伪”亦为士人当效法处世之道。范仲淹在诗中专以“鹤鹑”为例,也正是为了引出“孔颜乐处”的核心内涵。诚如瓢与颜回,焦尾琴与钟子期,“乐”之关节在于“思”与“遇”,只要天不亡斯文,士大夫就不应自怨自艾。“涧松怨山苗”典出左思《咏史八首》,范仲淹对士人古已有之的“怀才不遇”进行了温和的讽刺。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,范仲淹早年的“孔颜乐处”观除了强调士大夫于困境之坚守以外,还多出一层理性内省的味道。在范仲淹看来,“孔颜之乐”虽然强调“以苦为乐”或者“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”,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讨论士人如何通过心性修持而达到“苦乐无异”的境界。当然范仲淹并不是空言心性,在入仕之前的学习中,他就开始严格要求自己,欧阳修称其“少有大节”^{[11]624}。朱熹盛赞其“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”^{[13]3086}。《范文正公集·年谱》引魏泰《东轩笔录》,范氏在长白僧舍苦读期间“日作粥一器,分为四块,早暮取二块,断蕪数茎,入少盐以啖之,如此者二年”。又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记载范仲淹在睢阳学舍苦读时,“冬夜惫甚,以水沃而,食不给,至以糜粥继之。”^{[15]10267}可以说,从一开始范仲淹就将“孔颜乐处”当成一个“知行合一”的整体加以看待。在经历了诸般世事沉浮后,范仲淹对于“孔颜乐处”又有了新的理解。

庆历六年,范仲淹已经58岁,时知邓州,在此写成闻名遐迩的《岳阳楼记》:“嗟夫!予尝求古仁人之心,或异二者之为。何哉?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;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曰: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乎。”^{[9]194}范仲淹用这段话旗帜鲜明地回应了当年寒窗求学时坚守“孔颜乐处”的誓言。范氏所言之“己悲物喜”与世俗“悲喜”之不同,关键在于“物”与“己”二字。“物”,外物是也,然而在此并不特指物质财富,还应包含士人的外部生存环境。范仲淹所反对的,是士大夫因为外来“诱慕”而产生的平庸之“喜”。对于“己悲”的理解,人们往往会望文生义地认为是士大夫自己的忧愁。如果把“己”不简单视为“一己”或“自己”,而是与“心”作同一解读,就会发现范仲淹并不是单纯要求士大夫不可悲伤,而是不要被由内心惶惑带来的消极情绪所笼罩。“悲”与“喜”又是一对彼此相互依存的概念,没有悲伤何来喜悦,所以外物的得失会直接影响士大夫内心的状态,而内心的起伏又会反过来决定士人对于外物的取舍。换言之,在范仲淹看来,士大夫的悲喜不过心中有关得失的一念之差。正如老子所言:“生而不有,为而不恃,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,是以不去”^{[11]80},士大夫无得失心,亦无喜怒心,亦为《金刚经》所言:“吾无我相,无人相,无众生相”。范仲淹认为士大夫持权柄,居庙堂,当心系百姓之苦;受贬黜,逢不遇,当心存君王之恩。“忧民”、“忧君”不同于“己悲”,是士大夫内在人格力量的外化正向辐射。士人根身立命之本不在一己之进退得失,而在于对天下兴亡的责任与担当。所谓“先天下忧”和“后天下乐”更是强调士大夫之“忧乐”非一己之“忧乐”,也就是说士人应当突破个人情感的束缚,将自己融入广阔的社会历史洪流当中,进而超越世俗“忧乐”,实现“孔颜之乐”或是所谓的“道义之乐”。郑志强在《范仲淹〈岳阳楼记〉“忧乐”思想与艺术新论》一文中就认为:“一个‘后’字,则要求政治家在重大谋划取得成功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幸福安康之‘乐’时,能保持‘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’的高尚情怀。”^[12]李存山《〈岳阳楼记〉的政治

文化内涵》一文也持有类似观点:“则范仲淹‘忻然’而‘不悔’,其一生岂无乐耶?其必曰:吾有‘道义之乐!’”^[13] 诸葛忆兵认为这种“先忧后乐”的精神“是范仲淹自我品德完善的最高境界,是范仲淹报国立民追求的最完美表现,也是范仲淹一生言行最精炼的总结,更是北宋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最凝练的表达”^[14]。范仲淹之所谓“孔颜乐处”,本质上是一种理想化的士大夫人格。作为范氏后学的周敦颐、二程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“孔颜乐处”的内涵和意义。

二程早年曾就学于周敦颐处,周子常命二子寻“孔颜乐处”。《二程全书·遗书》:“昔受学于周茂叔,每令寻颜子、仲尼乐处,所乐何事?”^[15]可见作为理学重要奠基者之一的周敦颐事实上也将“孔颜乐处”视为其学说的核心命题。那么周子是如何认识“孔颜乐处”的呢?其有云:“颜子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夫富贵,人所爱也。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,独何心哉?天地间有至富至贵、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,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。”^[16]周敦颐认为富贵为世俗人所爱本无不妥,然而颜回却能“乐乎贫者”,根本原因是他找到了超越物欲享受“至富至贵、可爱可求”之物。与此物之大相比,红尘物欲其小不可见,而大又如何体现呢?周子云:“见其大则心泰,心泰则无不足,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;处之一则能化而齐,故颜子亚圣。”^[17]周敦颐认为在领会到“孔颜乐处”的至大高妙之后,士人心性自然归于泰然,不再纠结于得失,世俗富贵与贫贱也就“处之一也”。那么对于士人而言,何物又为真富贵?周敦颐有这样的回答:“君子以道充为贵,身安为富,故常泰无不足,而铢视轩冕,尘视金玉,其重无加焉尔。”^[18]士人以“天道”与“身安”为人生最大之富贵,故轩冕金玉自失其重,也就是说“孔颜乐处”之“乐”乃“天道同一”之乐。于是,当今学者陈天林认为:“周敦颐的‘孔颜乐处’可以分为富贵之乐、处一为乐和参同为乐三个方面,并且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他的乐境。”^[19]洪梅则认为周敦颐“孔颜之乐”主要体现在见“大”忘“小”的同天之乐,以及“万物和顺”的“中和”之乐两个方面^[20]。作为周敦颐的门生,二程继承并发展了周子的学说。二程对于“孔颜乐处”的理解主要分为两个层次。首先是“鸢飞鱼跃”之乐。《二程集》:“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,言其上下察也。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,与‘必有事焉而勿正心’之意同,活泼泼地,会得时;活泼泼地,不会得时,只是弄精神。”^[21]二程不同于范仲淹,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突出作为,也恰恰因摆脱了政务的束缚,二程才可以放心追寻以“鸢飞鱼跃”为表征的自然之乐,此处颇有孔子“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的气格。其次乃是“循理”之乐。《二程集》:“乐循理之谓君子”。若勉强,只是知循理,非是乐也。才到乐时,便是循理而乐,不循理不为乐,何苦而不循理,自不须勉强也^[22]。程颐之所谓“循理”强调的是士大夫对于“天道”的顺应,换句话说就是“知理”而乐。“道”本身是客观之存在,并不能为士人带来快乐,而“循”方为获得“孔颜之乐”的不二法门,诚如程颐所言:“使颜子以道可为乐而乐乎,则非颜子矣。”^[23]在这里“循”与“乐”的逻辑关系中,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,缺乏前者,后者没有成立的可能。也就是说,程颐将“乐”看成循理的自然结果,而非人为诉求。

通过对范仲淹、周敦颐、二程诸家“孔颜乐处”观的描述可知,周子与二程之说较为偏重形而上层面哲思的探讨,而范公之说作为众家之源,与当时庆历变法的政治形势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。也就是说对于以周敦颐、二程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先驱而言,“孔颜乐处”更像是一个关涉心性修养的哲学论题;而对于范仲淹而言,则是支持其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思想武器,这一点在其诗歌创作中有着较为明显的表现。

二、范仲淹塞上咏怀诗中的“孔颜乐处”

和一般“文士”相比,除了政治舞台上的纵横驰骋,经略西北抗击西夏无疑是范仲淹人生中一抹别样亮色。在入值中枢之前,十年的边地征战锤炼了范氏坚贞不屈的品格,为其日后推行庆历新政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。作为一名伟大的文学家,范仲淹在西北前线紧张的战争中创作了一些极具特色的塞上诗,这些诗篇虽然数量有限,却很好地诠释了诗人“孔颜乐处”的人生理想^②。如《依韵和延安庞龙图柳湖》:

种柳穿湖后,延安盛可游。远怀忘泽国,真赏即瀛洲。江景来秦塞,风情属庾楼。刘琨增坐啸,王粲斗销忧。秀发千丝堕,光摇匹练柔。双双翔乳燕,两两睡驯鸥。折翠赠归客,濯清招隐流。宴回银烛夜,吟度玉关秋。胜处千场醉,劳生万事浮。王公多雅故,思去共仙舟^{[9]121}。

这首诗写于康定元年秋,当时范仲淹升任龙图阁直学士,陕西经略安抚副使,受命前往陕西抗击西夏的侵略。在诗中提到的庞龙图是和范仲淹并肩作战的龙图阁直学士庞籍,这首诗是二人彼此唱和之作。范仲淹在诗中传神刻画了延安柳湖的旖旎风光。如果仅从字面来看,谁都无法相信此诗出自一位临危受命的边将之手。在范仲淹眼中,位于西北边塞的延安柳湖和江南水乡一样风情可人,自己为国戍边也和刘琨、王粲饮酒作乐一样充满情趣。诗中意境一派莺歌燕舞,处处温柔香暖,似乎边患早已远去,但这一派升平之色的背后却隐藏着诗人心中的诸多深意。首先,在整首诗中诗人没有流露出一点对残酷战争的不安,甚至连一般边塞诗中对胜利的渴望与憧憬都没有。其实,当时范仲淹是临危受命,陕西前线形势可谓岌岌可危。在西夏崛起之后,北宋连续丢失了甘凉故地的大片领土,西夏党项族骑兵不断剽掠陕西,兵锋大有威胁东京汴领之势,在范公抵陕之前,宋军可谓屡战屡败,防线不断向后收缩。范仲淹诗中闲庭信步的背后,是对守土抗敌责任的坚定担当,是在向世人传达出必胜的决心和信心。在他看来,就算是苦寒的西北也是祖国领土的神圣组成部分,无论战争如何艰苦,自己都要时刻保持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的心态,那么也就无所谓塞外江南之分,残酷的战争与轻松的宴游也就没有了界线。这也就是前文反复说到的“孔颜乐处”之精髓所在,范仲淹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边塞诗作都有这样的特点。又如《城大顺回道中作》:

三月二十七,羌山始见花。将军了边事,春老未还家^{[9]120}。

如果不考察创作背景,这首诗很可能被当成士大夫郊游咏怀之作。其实这首五言绝句背后包含着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——大顺城的修建。在范仲淹防守陕西的初期,朝廷偏信韩琦的进攻策略,盲目发动冒险的军事行动,结果造成了著名的“好水川之败”。庆历二年三月,范仲淹密令长子范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,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。他本人则随后引军出发,用早已备好的器材就地筑城。范仲淹的这一举动使得西夏方面猝不及防,从此陕西前线的战略形势得到了根本改善,这也成为了宋夏之战的转折点所在,从此北部中国进入了宋、辽、西夏三方并立的全新历史阶段。回到诗中,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老将在取得重大胜利后的欣喜。在范仲淹眼中,一座小小的大顺城已经成为敌人不可能撼动的堡垒,而自己也实现了许久以来的心愿,终于可以不辱使命,凯旋还朝,但诗人又将这种喜悦表现得如此释然,似乎只是“山花”与“春色”中不经意间的举手之劳。这种常人难以做到的超脱正是范仲淹“孔颜乐处”人生理想的最好体现。又如《与张焘太博行忻代间因话江山作》:

数年风土塞门行,说着江山意暂清。求取罢兵南国去,满楼苍翠是平生^{[9]122}。

在这首诗中,范仲淹道出了自己对战争本质的深刻体悟。在他看来,金戈铁马浴血厮杀的目的应是打击好战分子,恢复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,而非用战士和百姓的鲜血来为自己换取荣华富贵与高官厚禄。等到罢兵熄战的那一日,自己就要回到南国的秀色之中,用满目的苍翠来洗去战争的烟尘。我们从这首诗中还能读出“孔颜乐处”的另外一层深意——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在范仲淹看来,士大夫真正的“乐”是实现后的放下与释然。在这里,范仲淹所推崇的“孔颜乐处”实际上是儒道精神的高度合一,正如《老子》第二章:“万物作焉而不为始,生而不有,为而不恃,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,是以不去。”^{[11]81}士人功成之后,消失在山水烂漫之间,还自己内心一番平静,方为人间至乐。

最后可以用范仲淹《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》作为总结:

优游滕太守,郡枕洞庭边。几处云藏寺,千家月在船。疏鸿秋浦外,长笛晚楼前。旋拨醅头酒,新炮缩项鳊。宦情须淡薄,诗意定连绵。迥是偷安地,仍当饱事年。只应天下乐,无出日高眠。岂信忧边处,干戈隔一川^{[9]121}。

这首诗作于庆历四年,同年宋夏边境战争告一段落,范仲淹被调离陕西前线重回中央任职,此后在其领导下伟大的庆历改革也就拉开了大幕。范仲淹在即将离开之时,没有向好友夸耀自己数年来的峥嵘功绩,反而表现出对于闲云野鹤生活的淡淡追思。在范仲淹看来,仕宦的热情早已淡然,只有士人之间诗歌的吟咏唱和才是他心灵的归宿。在完成了历史赋予的既定使命后,范仲淹开始重新思考属于自己的“孔颜乐处”。那将是一种赤子般的简单快乐,在天下无忧后,放下所有,安然入睡,纵使日上三竿,依然鼾声不绝。从这一点不难看出,此时范仲淹在人生境界上比原始的“孔颜乐处”有了新的提升。

三、范仲淹政治咏怀中的“孔颜乐处”

前文已经谈到,范仲淹“孔颜乐处”观中包含有“知命同一”的思想,但是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,仅仅做到这一点远远不够,有时更需要的恐怕还是“有为而作”的勇毅和坚守以及士大夫无私无畏的“天下意识”。

众赞背后,范仲淹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承受了他人或许无法想象的压力与伤害。《范仲淹评传》:“(范仲淹)一下就把自己推向政治风浪的浪尖漩涡中去。守旧势力的强大,最高统治者的始从终弃,祖宗家法的掣肘限制,使他陷入功败垂成、激流勇退的两难境地。”^[19]具体而言,范仲淹面对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。首先,仁宗皇帝对于“庆历新政”态度摇摆不定。每当有人进言攻击改革,仁宗皇帝总会借机干扰甚至阻断正在推行中的新政^[20]。范仲淹最亲密的战友欧阳修曾针对此问题进言神宗:“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,必不自怠,而中外大臣且忧国同心,必不相忌而沮难。然臣所虑者,仲淹等所言,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,方能救数世之积弊。如此等事,皆外招小人之怨怒,不免浮议之纷纭,而奸邪未去之人,亦须时有谗沮,若稍听之,则事不成矣。”^{[11]554}欧阳修从侧面委婉地批评了仁宗皇帝在改革问题上的优柔寡断,建议仁宗肃清视听,痛下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。其次,范仲淹时常被人构陷借改革之名而行结党乱政之实。景祐三年,范仲淹不满吕夷简任用私人,以“百官图”一幅上书仁宗,指其次第曰:“如此为序迁,如此为不次,如此则公,如此则私。况进退近臣,不宜全委之宰相。”^{[5]10267}加之论“建都洛阳”之事,范吕二人发生激烈争执,吕夷简指控范仲淹及其支持者为乱政“朋党”,经过双方激烈的斗争博弈,最终两败俱伤,吕夷简被罢职,范仲淹也被贬饶州,再贬润州,又贬越州,期间就连为范仲淹鸣冤叫屈的欧阳修也被累遭贬。庆历四年十一月十二日,仁宗借“进奏院案”之名再次打击范仲淹,特地发布诏书严厉斥责朝内大臣所谓“结交朋党”的不轨举动,警告臣下切勿“忘君恩”而“更相附离,以沽声誉”,或利用荐贤之机收受贿赂,并严戒“诋斥前圣,放肆异言,以訛上为能,以行怪为美”。庆历五年十一月,仁宗以“边事安息、盗贼衰止”等借口削夺范仲淹陕西四路安抚使之职,再次外放邓州^[21]。表面看似宽松的北宋政治气氛只要一涉及“朋党”问题,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。范仲淹的好友欧阳修作《朋党论》,一针见血地指出,君子有朋为国,小人结党营私,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,由此范仲淹也就格外强调逆境中士大夫操守和担当的重要意义。如《四民诗·士》:

前王诏多士,咸以德为先。道從仁义广,名由忠孝全。美禄报尔功,好爵縻尔贤。黜陟金鉴下,昭昭媿与妍。此道日以疏,善恶何茫然。君子不斥怨,归诸命与天。术者乘其隙,异端千万惑。天道入指掌,神心出胸臆。听幽不听明,言命不言德。学者忽其本,仕者浮于职。节义为空言,功名思苟得。天下无所劝,赏罚几乎息。阴阳有变化,其神固不测。祸福有倚伏,循环亦无极。前圣不敢言,小人尔能臆。禘灶方激扬,孔子甘寂默。六经无光辉,反如日月蚀。大道岂复兴,此弊何时抑。末路竞驰骋,浇风扬羽翼。昔多松柏心,今皆桃李色。愿言造物者,回此天地力^{[9]23}。

在这首诗中,范仲淹清晰地勾勒出心目中士大夫理想人格修养的轮廓。在开篇处,范仲淹虽然还是把“仁义广”、“忠孝全”这些道德层面的因素放在了首位,但是笔锋一转,马上切入对士大夫担当勇气的强调。范仲淹认为朝廷上下忠奸并存,且往往奸佞小人会一时得势,此时士大夫如果仅仅把这一己失意归咎于天

命的安排,那么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就会趁虚而入,朝政也就会陷入“异端千万惑”的混乱局面。所以士大夫要听从内心至高道德标准的召唤,不要因为一时的命运不济而自怨自艾,从而放弃应有之担当。更进一步地说,士大夫除了在正邪斗争这样大是大非的时刻要保有战斗的勇气外,在日常工作中更要注意不能“学者忽其本,仕者浮于职”,尤其不可把工作仅仅当成自己获得功名利禄的手段,一味逢迎,避难就易。在全诗的最后,范仲淹毫不客气地指出目前的士大夫已经无“松柏心”,皆“桃李色”,希望造物主能够改变这种颓败的士人风气。诗人在《岁寒堂三诗·君子树》中更是鲜明地在“松柏心”和“桃李色”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

二松何年植,清风未尝息。夭矫向庭户,双龙思霹雳。岂无桃李姿?贱彼非正色。岂无兰菊芳?贵此有清德。万木怨摇落,独如春山碧。乃知天地威,亦向岁寒惜。有声若江河,有心若金璧。雅为君子材,对之每前席。或当应自然,化为补天石^{[9]34}。

范仲淹托物寓意,以劲松之德自比。松树与清风为伴,身姿夭矫挺拔;劲松不屑桃李妖冶的姿色,独慕兰菊之清纯傲立;在万木摇落凋零的岁寒时节,劲松青翠如故,独自面对冰刀雪剑,天寒地冻;松柏声涛如江河,气势磅礴;松柏内心如金璧,坚贞赤诚。通过这些勾勒,松柏之清高脱俗、纯正浑厚、桀骜不驯、坚强刚武等品德跃然纸上,松柏乃当之无愧之“君子材”。范仲淹借此勉励所有士大夫,希望天下士人都能够像松柏一样拥有承当风霜雪雨的勇气。

还有一首诗,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咏怀诗,却同样可以体现出范仲淹政治理念中的“孔颜乐处”观。《送鄜乡尉黄通》:

少年好逸骥,老者重安车。争先尚逐逐,致远贵徐徐。勿言一尉卑,千户击惨舒。外矜固不足,内乐则有馀。子游与季路,作邑宁歎嘘。五斗对万钟,所问道何如^{[9]51}。

这首诗作于邓州,时间大约在庆历新政失败后不久,因为没有留下较为准确的创作背景,所以只能依照内容推断,黄通其人担任鄜乡尉,负责地方治安,然而他不安本职,有好高骛远之嫌,范仲淹作诗规劝勉励之。范仲淹在诗中指出县尉虽位卑言轻,却为一方镇守,身系百姓安危福祉。诚然身为县尉,的确没有什么可向外人炫耀的资本,然而乐职尽责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内心欢乐。“五斗”与“万钟”虽然有巨大的差别,但与士大夫奉行天道所带来的快乐却没有区别。

范仲淹用“孔颜乐处”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,并在此指导下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,而作为一个诗人,范仲淹将“孔颜乐处”深深地内化入自己的诗学精神当中。正因为如此,范仲淹的政治咏怀诗和塞上咏怀诗才会显得富丽中见峥嵘,闲散后存血性。这也是“庆历”士人政治伦理的集中体现,无论是纵论朝堂,还是浴血边疆,只要可以实现保国护民的政治初心,那便处处皆能“人不堪其忧,而回不改其乐”^{[7]267}。范仲淹的诗歌艺术水平虽然与同代苏黄相比略显逊色,但范公之诗表现出的高洁士人品格足以让其彪炳史册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欧阳修.欧阳修全集[M].李易安,校注.北京:中华书局,2001.
- [2] 苏轼.苏轼文集[M].孔凡礼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:312.
- [3] 黎靖德,王星贤.朱子语类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4] 黄宗羲.宋元学案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6:176.
- [5] 脱脱.宋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- [6] 王夫之.宋论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4:95-96.
- [7] 刘宝楠.论语正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0.
- [8] 朱熹.四书集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9] 范仲淹,李勇先,王贵荣.范仲淹全集[M].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7.
- [10] 严可均.全晋文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9:601.

- [11] 陈鼓应.老子今译今注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3.
- [12] 郑志强.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“忧乐”思想与艺术新论[J].江西社会科学,2010,(11):192-198.
- [13] 李存山.《岳阳楼记》的政治文化内涵[J].湖南社会科学,2005,(1):140-144.
- [14] 诸葛忆兵.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[J].中国人民大学学报,2006,(9):150-156.
- [15] 程颐,程颢.二程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- [16] 周敦颐.周子通书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.
- [17] 陈天林.乐境——论周敦颐的“孔颜乐处”[J].河北大学学报,2006,(1):47-51.
- [18] 洪梅,李建华.“孔颜乐处”的生态价值取向[J].齐鲁学刊,2012,(4):17-21.
- [19] 方健.范仲淹评传[M].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1:288.
- [20] 郑志强.范仲淹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在庆历新政中推行失败的原因新解及其对当代改革的启迪[J].江汉论坛,2010,(2):95-103.
- [21] 诸葛忆兵.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[J].江苏社会科学,2010,(5):222-227.

(责任编辑:彭晶晶)